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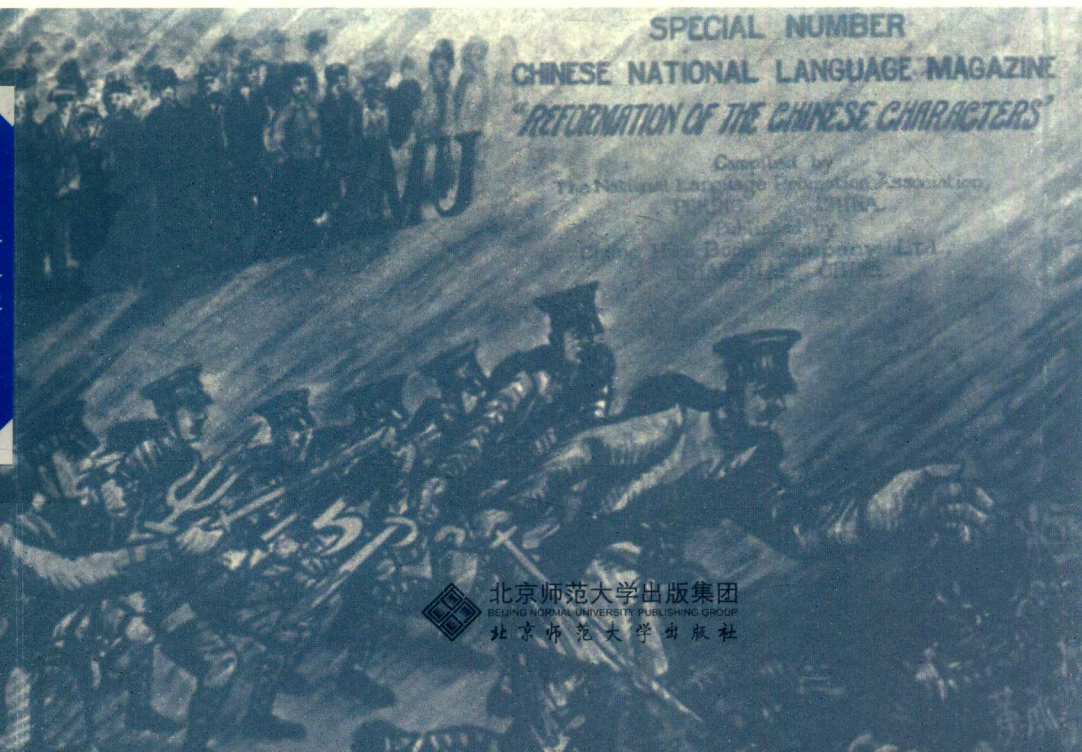
声入心通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王东杰 著

所谓语言随时代底变换而变换，其实就是随着生活底变换而变换。时代变换了人们底生活，生活又使语言受到它底影响，如斯而已。

——聂绀弩



声人心通

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王东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 王东杰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新史学 & 多元对话系列)

ISBN 978-7-303-24475-1

I. ①声… II. ①王… III. ①汉语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534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 <http://xueda.bnup.com>

SHENG RU XIN TONG GUOYU YUNDONG YU XIANDAI ZHONGGUO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34.5
字 数：57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美术编辑：李向昕
责任校对：段立超

责任编辑：曹欣欣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目 录

导言：语言与历史	1
一、语言与民族主义	3
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	13
三、国语运动小史	25
四、论域的展开	33
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	38
第一章 从文字变起：清季社会思潮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46
一、文字与富强	48
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	57
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	71
四、文字与进化	78
五、余论	89
第二章 一个国家，两种文字：切音字运动中的“国民”与“国粹”	96
一、造就“国民”	96
二、“保存国粹”与切音字运动	106
三、“简字”不“简”	114
四、余论	127
第三章 声入可否心通：切音字运动与“国语统一”思潮的纠结	138
一、“声音文化”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139
二、切音字运动与“语言统一”的提出	144
三、一步到位与“两次办法”	158
四、余论	169

第四章 文字起于声音：汉语拼音化思想对“因声求义”说的继承式颠覆	180
一、因声求义	185
二、因声造字	194
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	206
四、余论	217
第五章 废汉字以救汉语：白话文运动与汉语拼音化论证策略的调整	222
一、“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	223
二、“打破不进步的字，讲天天进步的语言”	235
三、“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	243
四、结论	254
第六章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259
一、语言学形态分类法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60
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胡以鲁的观点	267
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	274
四、对汉语先进论的否定及另一种语言进化观	283
五、余论	291
第七章 “代表全国”：国家建构与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	300
一、独用京话与会通异言	302
二、取决于“多数”	309
三、采用“活语言”	318
四、反对“北平话”	329
五、结论	336
第八章 汉语是“一个”：国语运动与汉语“方言”的确立	341
一、“方言”的语义内缩	343
二、论证汉语方言同源性	353
三、“当代”导向与历史寻索	364
四、左翼文化人的意见	372

五、余论	382
第九章 “打折”的统一：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388
一、“国语不统一主义”的提出	390
二、“双语”制的实践	399
三、改良的“蓝青官话”	408
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	417
五、余论	428
第十章 必也正名乎：现代政治与标准语的名相嬗替	432
一、从“官话”到“国语”	433
二、“普通话”对抗“国语”	445
三、“普通话”的胜出	456
四、结论	463
结语：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466
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对外和对内	469
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	483
三、文字与语言：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	496
附录 清季切音字方案一览表	509
参考文献	512
后 记	544

导言：语言与历史

《庄子·大宗师》曾借孔子之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说的是“道术”，但道理显然不只适用于“道术”。凡人所借以生存而须臾不可离者，皆如鱼之于水，是很容易“相忘”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与认同提供了可能和限界，同样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物。但与庄子所倾心的不同，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无事生非”，将那些被遗忘之物重新唤回我们的意识之中，使其成为我们审视的对象。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史”(New Social History)的兴起，语言也和身体、姿态、衣着等日常事实一样，引发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催生了一个被称为“语言社会史”或“语言文化史”的领域。^①

语言仿佛空气一般，弥漫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它将物质与心灵、群体与自我、过去与未来串联衔接，使世界成为一个可被我们认识和利用的整体。人受制于世界，也受制于语言。借用一个曾经时髦一时的

^① Roy Porter, “Introduction”, 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 *Language, Self and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1. 关于语言社会史研究的通论性概述，一个较为简明的文献是 Peter Burke, “Introduction”, 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7. 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伯克不但是语言社会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与本书论题关系最为密切。

比拟，语言乃是人的“牢笼”。^①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 1925—2018)曾说：一个人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他“是谁”。^② 当然，一个人“是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的事实，不能全由自主；而且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其实也未必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语言的权利和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表达自己的‘真正’所指”的能力，就会使“真理”趋于“模糊”，同时也丧失了通过行动而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似是而非”的支持者。^③

可是，这的确并不等于说，人在语言面前是纯然被动的——即使受到很大限制，他还是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同样是韩礼德说的：“当讲话人宣称他讲哪一种语言时，实际上他是在界定一个语言社团。”也就是说，他试图界定那些自认为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④ 与此同时，他也界定、塑造乃至“发明”了一个“自我”。埃德蒙·利奇(Edmund R. Leach, 1910—1989)在对缅甸克钦地区族群和语言状况的分析中也指出，“一个人说这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它是个人身份的一种声明”，或者表示“团结”，或者表示“社交距离甚至敌意”。^⑤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多个语言频道之间顺利转换的能力，但如此种种仍然表明，人在语言面前是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语言的牢笼》(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合刊本)，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不过詹姆逊的说法具有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我的意思要更为宽泛一些。

②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苗兴伟、董素蓉、赵卫译，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 布尔迪厄主要强调的是被统治阶级在话语上的无力：“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途”所具有的“强制合法和审查作用”，使得“被统治者的发言人”也不得不将它们“默认为政治观点的合法表达方式”。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语言实际上“剥夺了它被认为要表达的说话人的经验”，甚至使得发言者远离自己的阶级所面对的“问题”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体验”。详论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刘晖译，731～7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④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5、6页。

⑤ 埃德蒙·R. 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可以有所作为的。^①而事实上，人的行动能力比这还要积极得多：他可以改造语言，进而改变世界；同样，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社会变革并不只是物质和组织的变革，也是更深层次的语言、情感与认知的变革，而后者并不只是前者的被动结果，也常常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的角色。从这个特定角度看，历史在语言和世界的互动中进行。

一、语言与民族主义

在以语言为主题的社会变革故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成长恐怕要算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了。自民族主义诞生开始，语言就被视为民族区分的主要指标之一，和传统、历史、文化等殊异性现象一起被视为族群认同的根基。文艺复兴时期，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打破拉丁文的一统天下，采用意大利语入文，常被认定为民族主义观念的起源，也是语言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经典例证。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强调，“民族”或“人民”(das Volk)成立的首要条件乃是国土和语言，而不是种族、肤色或信仰。^②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对于一个新建国家来说，写本语法书，编一部辞典，无不宣示出政治意图”^③。实际上，对语言和民族或国家同一性的论述不胜枚举，并不限于欧洲，而且日益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存在(既可能是实际的存在，也可能是认知和想象层面上的存在)，

① 这里涉及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和认同关系问题的争论，可参考大卫·伊文斯的概述(David Evans, “The Identities of Language”, in David Evans ed., *Language and Identity: Discourse in the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15-34)。伊文斯本人则将语言视为一把双刃剑。在他看来，通过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竖起一道界墙，语言就将人们的认同“局限”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但它也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们得以“跨越界线”，从而也使得认同获得了“解放”。(参见他在前述书中“引言”里的论述，第4页。)

②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见《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③ Tony Crowley, *Standard English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56.

人们通常认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的变化，同时也是一个语言版图的变化。^①

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人卷入更加异质和混杂的情境中，但语言仍是各类民族主义或准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来源之一。比如，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眼里，中欧诸民族“对民族生存的争取”和“对他们自己语言的保全”，从来都是一体之两面。^②即使身处一个“多语时代”(multilingual age)，即便是在“网络世界”中，我们仍然深深地被语言认同所引发的各种社群冲突所困扰。^③事实上，似乎有些吊诡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运动方向与“全球化”正好相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如此)，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却正得力于“全球化”进程，而后者反过来也对语言民族主义提出了新考验。^④

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对它的研究远远早于一般的“语言社会史”。早在 20 世纪初，杰出的社会史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或译“屈勒味林”，1876—1962)在其巨著《英国史》中，就为“英吉利语言之起”辟出专门章节，可视为英吉利民族意识凸显的重要

① 试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的一段描述：“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亚的斯亚贝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远距民族主义》，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73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请注意“大帝国”前边的“多语种”这个修饰语。

② Kyra Giorgi, *Emotions, Language and Identity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03. 此书将捷克的语言民族主义追溯到 17 世纪初，详论见第 103~107 页。

③ 一组多方位的研究参见 Tony Judt and Denis Lacorne eds., *Language, Nation, and State: Identity Politics in a Multilingual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④ Ronald Wardhaugh,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见林精华、Ken Henshall、Xiao Hong 主编：《民族认同和语言表述》，1~17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Máiréad Nic Craith, “Languages and Power: Accommodation and Resistance”, in Máiréad Nic Craith ed.,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1-17.

表征。^① 最近数十年，涉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无不把语言当作一个分析视角，在“语言民族主义”标签下，出现了大量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中描写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那一章被命名为“旧语言，新模型”(Old Languages, New Models)，提示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基本思路：“民族的印刷语言”(national print-languages)或“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vernacular languages-of-state)乃是追索欧洲民族主义成长的主线。^②

如同“印刷语言”一词所提示的，在语言民族主义主题下，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研究“书面语言”或文字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将“文字”视为“语言”的分支，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并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详论参看本书第四章)。英国社会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1925—1995)提出，农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文化的高度差异性，因为“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基本普及识字，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近代以来，以“识字”为基础的“高层次文化”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社会上下层阶级的界限，才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③ 易言之，民族国家的建构离不开识字能力的普及。与此相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也把“识字阶层”的膨胀当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和指标。^④

不过，学者们对于语言和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传统“根基论”指导下的民族主义研究中，语言被认为是“民族区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同的语言将人们区隔为不同的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关

① 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钱端升译，264～2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此外，该书还有多处注意到英国历史上的语言状况。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66～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引文分别在第66、75页。我同时参考了其英文本，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Thetford Press Limited, 1986, pp. 66-79, esp. pp. 66, 75.

③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14～15、38、5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1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键因素)。法国思想家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ï)尽管发现“民族国家通常并不是围绕着一门语言形成”，却仍然指出：“语言是最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可以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①政治学家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 1926—1992)注意到，在民族主义传播过程中，“自然疆界”常被等同于“一个由语言分布地图所确定的民族的疆界”。^②

但是，晚近以来，将“民族”视为主观性的构筑，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越来越盛行，并发展成为“工具论”的取向。这种观点认为，不同人群的区分乃是人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所做的选择，与其将其看作生物性和物质性的事实，毋宁将其看作一种社会生存策略。^③自然，在这种视野下，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区分民族的“客观”标准，也就一变而为人们缔造、宣示与展现民族身份的创作素材。尽管“工具论”主要从资源竞争的角度出发，似乎给民族主义涂上了一层功利性的色彩，但相对于客观主义的“根基论”，它倒更多地关注到了精神、欲望、情感和想象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工具论”的取向，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及其一系列周边概念的发明和散播，正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的动力之一。在此意义上，语言本身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积极“创造者”和“推动者”。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无论我们持“根基论”还是“工具论”态度，语言与民族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都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答案。霍布斯鲍姆指出，“把人种—语言作为民族的定义，基本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发明——而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④。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提出，民族并不建立在“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亲近感、地理或军事的必要性”之上。^⑤更具讽

①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195～1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② 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11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③ 有关“根基论”与“工具论”，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10～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④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p. 146.

⑤ 有关论述参见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2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刺意味的是，在 19 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1904)的设想中，由犹太人组成的新国家“在语言上将采联邦制”，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被迫离开的国家的语言”；而被禁止的恰恰是在东欧、德国等地犹太人中最为流行的“意第绪语”——对赫茨尔而言，意第绪语乃是“囚徒宵小所用的语言”。^① 近年来，将语言和民族解纽的主张越发流行。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杜加斯特(Jacques Dugast)强调：“作品的语言和作家的民族属性这两个因素并不总是吻合的。”^② 柄谷行人更是提出，语言或经济上的共同性不但“未必能够形成民族”，反而“常常成为民族产生的障碍”。^③ 许多人类学的实证性调查和研究也倾向于对此判断表示支持。^④

应该说，比起赫尔德等人的斩截断语，勒南等人的认知要更为复杂，更能贴近事物的本来面貌，但这也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实际上，准确地说，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并不单一，不同的情形同时存在。在此问题上，任何一元论认知都是天真的。比起物质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人们赋予语言的“意义”，与“认同”连在一起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因此，即使语言的疆界与民族的疆界并不完全吻合，也不意味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就不值得探讨。即便反对把民族的内涵建立在语言之上，也反过来证明，对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语言问题无法回避，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这进一步展示了语言民族主义概念的实际影响力；更何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和民族的对应关系，的确被视为天经地义，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

比这些可见的层面更隐秘但也可能更重要的是，语言并不只是一个认

① 有关论述参见卡尔·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258 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② 雅克·杜加斯特:《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黄艳红译，189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③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190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④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 1928—2016)主编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一书所收录的不止一个案例表明，语言的区分和族群的区分并无对应关联。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帕坦人的认同与维持》、卡尔·G. 伊西科维奇(Karl Gustav Izikowitz):《老挝境内的邻居们》，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106、132 页。

同的“象征”，它本身就“承载了一个群体或社会所由建立起来的价值”。因此，哪怕所宣示的是“同一种认同”，不同群体也会选择“不同的语言”。^①与此同时，有点貌似自相矛盾的是，语言也“无言地”沉入我们意识的深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用诗意的语言说：“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②在此意义上，语言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认同中最为幽深、曲折和日常的层面，在不动声色中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借用梁漱溟(1893—1988)的术语，我们不妨说，语言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意欲”(will)形态，并由此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样法”。^③

反过来，语言也因此成为被管制的对象。2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精彩著作告诉我们，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正确说话”不仅仅同“态度和礼貌”相关，也同“社会权利”相关，因为言语是“一个神圣社会的支柱”。这样，“管理口舌”(governing the Tongue)也就成了“家庭、邻里、市镇，甚至是帝国治理”的核心工作。^④这种管理当然不是彼时彼地特有的事业，而一直存在于人类各个社会中。比如，对印第安人来说，讲话方式、身体姿态等都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一位现代学者据此总结道，“社会化和社会管控，不仅在于说什么，也在于说话的方式”^⑤，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意义。言说之所以成为管理对象，正因其背后凝聚着不同的“意欲”取向。在这里，语言又一次通过“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形塑了认同。

① Philippe Chassy, “How Language Shapes Social Perception”, in David Evans ed., *Language and Identity: Discourse in the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 47.

② 乔治·斯坦纳：《K》，见《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③ 梁漱溟把“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我并不同意他的定义，不过仍认为有可以参考之处。

④ Jane Kamensky, *Governing the Tongue: The Politics of Speech in Early New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 9.

⑤ 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魏然译，2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对口头语言的管控虽然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社会，这种管控主要是通过家庭、社区等渠道进行的；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它主要作为政府行政治理系统的一部分，如“人口普查”的范畴。这使它更密切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但也因此挑起了更多的争端，尤其是事涉民族边界之时。^①当然，大多数情形下，政府对语言的管理是日常性的。面对一个复杂社会，国家要保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而对一个公民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必须熟练掌握官方语言，并且识文断字。不过，这样一来，语言管理中就出现了两种相异动机的交锋：一种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态度，意在提高语言本身的使用能力，无论这种语言被服务于何种用途；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态度，意在提升有利于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语言能力。^②对于后一种态度来说，语言是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手段存在的，一个人通过这种日常应用性质的微观教化，而被培养出某种特定的认同目标。^③这样，语言不仅是认同的表述，也通过表述创造认同。

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从管理和控制的角度思考国家这个政治体和语言的关系。至少，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看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根据爱尔兰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的诠释，在霍布斯看来，首先，是“语词的发明”将人们拉入了纷争之中，但是，语词也为人们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使得人们可以缔结契约以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的诞生。国家“不仅建立了一种共同的理解与协调，而且也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其中，人们可以给予他人语词，并通过将自己置于制裁的威胁下而赋予语词以可靠性”。语词为国家提供了“秩序”，而国

^① Dominique Arel, “Language Categories in Censuses: Backward- or Forward-Looking?”, in David I. Kertzer and Dominique Arel eds., *Census and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Race, Ethnicity, and Language in National Censu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2-120.

^② Dennis Ager, *Ideology and Image: Britain an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p. 107.

^③ 这方面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家也是“语言所赋予人类的积极能力的重要助推者”。^① 语言在政治权力之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除了被控制之外，它也有着驯化权力的积极可能。

上面的论述大多取材于欧洲，这是因为欧洲是语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发源地。但这些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理念和实践的扩散，这一旋律也在世界各地回响。^② 欧洲以外的语言民族主义当然主要还是追随欧洲“现代性”的结果，可这并不等于说，欧洲经验就可以覆盖和替代其他地区的故事。^③ 由于每个国家的“建国”过程所面临的族群、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别，这一旋律在扩散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变奏，使得语言民族主义的含义不断增加。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国语运动就是这些变奏中的一支。

尽管自古就存在所谓“夷夏之辨”，但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在中国，

① 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于明译，148~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启蒙运动时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则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把“社会”放在“国家”之前。参见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启蒙运动的再思考》，关依然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38页。

② 本书虽然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但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提出，在15世纪的西班牙，语言已是“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Joseph W. Esherick, 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 “Introduction”, in Joseph W. Esherick, Hasan Kayali and Eric Van Young eds., *Empire to Na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 3.)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指出：“在伊朗，波斯语一直都是历史上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准则。”(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导论，12~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法国大革命的语言观亦受到此前天主教教会观念的影响，参见 David A. Bell, “Lingua, Populi, Lingua Dei: Language, Relig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5, 1995, pp. 1403-1437.

③ 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6 [1953]; Joshua A. Fishman, Charles A. Ferguson and Jyotirindra Das Gupta eds., *Languag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68.

更为自觉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的。^①至于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我们可以拿梁启超(1873—1929)1901 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为例，略探其端倪。梁启超把近代欧洲“国家”观念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是“民族主义时代”，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后者是前者发展“既极”的结果。反观中国，则连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却不得不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侵迫，可谓危险至极。梁启超坚信：“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因此，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除了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之外，别无他途。^②这番话简劲有力，立刻触动了忧国之士的敏感神经。晚清文人赵炳麟

①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224～228 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不赞同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单纯的“近代”现象，而要在传统社会寻找其踪迹和根源。葛兆光教授认为，在宋代，与“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同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他视此为“近世民族主义”的“远源”。(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见《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131～151 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与此思路相类，梅维恒(Victor H. Mair)把现代国语和白话文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58～40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这些追溯性的思考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比这些古今相似性更重要的是，19 世纪末以后中国人“自觉”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已经使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它们都可能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 页，注释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而不是其组成“元素”：由于“民族”这一“统领性”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致“民族主义”)。这两个(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详论参见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88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② 任公(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清议报》第 95 册，1901 年 10 月 22 日，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影印本。